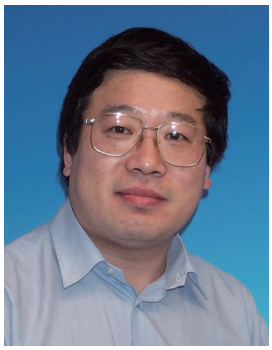
DOI: 10.13376/j.cbls/2017093
文章编号：1004-0374(2017)07-0687-08



唐惠儒，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及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994 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92—2005 年任英国食品研究所、帝国理工学院生物医学部 Senior Scientist 等。2005 年当选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FRSC)、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研究代谢物结构与功能、代谢组学及疾病发生发展的分子基础近 30 年。在 *PNAS* 等上发表 SCI 论文 160 余篇，被引 5 200 余次 (单篇最高引用 500 次、年均 50 余次)，H-index 41。部分工作被 *Science* 及 *Nature* 系列刊物作为“研究亮点”专文评述。曾任中科院生物磁共振分析重点实验室主任、科技部“973”项目与蛋白质 / 纳米科学重大研究计划等评审专家、*J Proteome Res* 编委。现任 *Metabolomics*、*Curr Metabolomics*、*Arch Pharm* 和《基础医学与临床》等编委，*Nature Partner Journal——Mol Phenom* 副主编。

王玉兰，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所研究员、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 PI、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3551”人才。1997 年获英国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博士学位，1997—2007 年先后任英国 BBSRC 属 JIC、帝国理工学院生物医学部 Senior Scientist 等。2008 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并任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首席科学家。从事代谢组学新技术及其应用研究近 20 年。在 PNAS 等上发表 SCI 论文 130 余篇，被引 5 300 余次 (单篇最高引用 251 次)，H-index42。应邀撰写英文著作 10 余章，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上做邀请报告 10 余次，出版著作 1 部。现任 *J Integrated OMICS* 副主编，*Metabolomics*、*Curr Metabolomics*、*Sci Rep* 及 *Nature Partner Journal——Mol Phenomics* 等编委；国际 Experimental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Conference (ENC) 的第一位亚洲执委，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生物磁共振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2015 年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称号。

哺乳动物与肠道菌群的共代谢相互作用

唐惠儒[1*]，王玉兰[2,3*]

(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及生命科学学院上海分子表型组国际研究中心，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遗传与发育协同创新中心，上海 200438；2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磁共振分析重点实验室，波谱与原子分子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磁共振中心，武汉 430071；3 浙江大学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杭州 310058)

摘　要：哺乳动物的消化道居住着数以万亿的，数千种共生微生物或者肠道菌群。肠道菌群与动物宿主通过共进化而共生并经过相互作用而影响其生理与病理生理过程。胆汁酸、胆碱、膳食纤维及芳香类代谢物等多种物质的共代谢是该相互作用的关键分子过程，肝肠循环是上述物质交换与调控相互作用的主要途径。肠道菌群组成与代谢组的关系及其功能的精确刻画是急需解决的科学问题。

关键词：肠道菌群；哺乳动物；肝肠循环；共代谢组；代谢组学
中图分类号：Q939.9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7-07-11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2017YFC09068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1439102，21375144)
***通信作者**：E-mail: huiru_tang@fudan.edu.cn (唐惠儒)；yulan.wang@wipm.ac.cn (王玉兰)

Co-metabolism：vital interactions between mammals and symbiotic gut microbiota

TANG Hui-Ru[1]*, WANG Yu-Lan[2,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netic Engineering, Zhongshan Hospital and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Molecular Phenomic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Genetics and Development, Shanghai 200438, China; 2 CAS Key Laboratory of Magnetic Resonance in Biological Systems,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agnetic Resonance and Atomic and Molecular Physics, National Centre for Magnetic Resonance in Wuhan, Wuh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1, China; 3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rillions of microbes also known as gut microbiota live in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GIT) of mammals with more than two thousands species. These gut microbiota and their mammalian hosts undergo close interactions to form symbiotic "superorganisms" through co-evolution, contributing towards the physiological and pathophysiological processes of mammals. Co-metabolisms of bile acids, choline and carnitines, dietary fibers and aromatic compounds are the major host-microbial interactive exchanges of bioactive metabolites whilst enterohepatic recirculation is the major route for such exchanges and regulations. Accurate definition of the gut microbiota, metabolite composition and their functional relationships is urgently required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host-micriobiota interactions and implication in mammalian health.

Key words: gut microbiota; mammals; enterohepatic recirculation; co-metabolism; metabolomics

1 哺乳动物是“超级生物”

正常的哺乳动物都是“超级生物”，是由宿主与数千种微生物组成[1-3]并通过共进化而形成的共生体[3-5]。因此，哺乳动物的生理与病理生理过程均需要考虑宿主本身、共生微生物群及二者的相互作用[1-4]。宿主的消化道居住着数以万亿的共生微生物群，它们被称作肠道菌群或者微生物组[2-7]。成年人肠道中有将近 1.5 kg 的数千种微生物，它们通过与宿主的协同发育而影响宿主健康的各个方面[3-7]。肠道菌群被认为是动物宿主的又一必需“器官”而构成动物的拓展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与代谢组[4,7-8]。由于肠道菌群中多数物种尚无法进行体外培养，目前还无法像 (人类与啮齿动物等) 宿主一样对肠道菌群的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及代谢组进行精准测定。

肠道菌群的结构 (或者微生物组成) 既依赖于宿主的基因型、年龄与生理状态等内因，也依赖于宿主的饮食与生活条件等环境因素[2-10]。肠道菌群的功能包括对宿主免疫系统的塑造[11-15]、食物消化与营养吸收[16-24]及对药物与胆汁酸等代谢的调控等多个方面[25-29]。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菌群与大肠癌[30-31]、炎症性肠病[12]、代谢性疾病[16-23]、动脉粥样硬化[32]以及神经性疾病[33-34]等多种病理过程相关。因此，哺乳动物肠道菌群的结构与功能已成为微生态学[2-10]、病理生理学[16-23,30-36]、药物代谢与疗效[37-39]及宿主与肠道菌群作用[3-10,24,40-41]等诸多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2 哺乳动物与肠道菌群的共代谢相互作用

共代谢是哺乳动物宿主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共代谢通常经过肝肠循环而进行宿主与肠道菌群之间的代谢物交换[25-28]。其中，绝大多数在体内循环的胆汁酸[25-28]、尿液中的芳香类代谢物及胆碱的代谢物均是典型共代谢产物[35-37,42-47]。譬如，植物多酚与苯丙氨酸等芳香类物质由肠道菌群代谢产生苯乙酸与苯甲酸，而后在肠道吸收并经肝门静脉进入宿主肝脏，再通过甘氨酸等复合代谢而产生苯乙酸甘氨酸与马尿酸，最后由尿液中排出[35-36,42-46]。尿液中的吲哚与对甲基苯酚等芳香类代谢物也通过相似的共代谢途径而形成[42-46]。尿液中的甲胺、二甲胺、三甲胺及其代谢物氧化三甲胺则源于肠道菌群对胆碱与肉碱的代谢[35-36,44-46]。这些共代谢物对宿主的健康有深远的影响。

胆汁酸是宿主 - 肠道菌群之间“合作”最为紧密的一类共代谢物。大约 95% 的胆汁酸由宿主肝脏及肠道菌群之间进行转化并在体内循环使用[24-28]。哺乳动物肝脏通过羟基化与异构化将从头 (*de novo*) 合成及食物来源的胆固醇转化为胆酸与鹅胆酸，再通过羟基化、与甘氨酸及牛磺酸等结合而形成数十种初级胆汁酸[25-28]。之后，它们通过胆管被排入肠道而实现其乳化并协助脂肪酸吸收的功能。同时，

肠道内居住的菌群会对这些胆汁酸进行去结合 (甘氨酸与牛磺酸等)、去羟基化等代谢而再转化为初级胆汁酸，还会对初级胆汁酸进行代谢而形成脱氧胆酸、石胆酸等一系列次级胆汁酸 [25]。上述胆汁酸通过肠吸收而经肝门静脉进入肝脏，进行第二轮肝肠循环。它们在亲脂性维生素吸收、宿主的内分泌功能、避免肠道微生物的错误移位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25-26]。因而，肠道菌群对宿主生理过程的调控有其不可或缺的功能 [25-26]。正常生理条件下，大约 80% 的胆汁酸在小肠的空肠与近端回肠完成吸收，5% 由回肠中段及末端完成吸收，10% 胆汁酸通过大肠吸收，这些吸收的胆汁酸通过肝肠循环而进入肝脏 [24]。 只有 5% 的胆汁酸经大便排出体外 [24]。尽管大肠所吸收的胆汁酸较少，但这些却与大肠癌、炎症性肠病及肝癌等重大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相关详细的机制尚需深入研究。

事实上，肝肠循环也是宿主与肠道菌群对药物等外源性物质进行共代谢的关键过程。譬如，多种药物的吸收、(共) 代谢及排泄均与肠道菌群对药物的活化和解毒等功能密切相关 [25-26]。食源性胆碱对哺乳动物健康的影响很可能与肠道菌群降解产物二甲胺、三甲胺及其共代谢物氧化三甲胺有关 [48]。肝肠循环还是宿主与肠道菌群协同代谢芳香类氨基酸 (苯丙氨酸、酪氨酸与色氨酸)、食物 (或植物药) 来源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的关键过程。这个循环过程为宿主肝脏及肠道菌群之间的共生相互作用提供了有效且严密调控的特异途径。宿主大肠黏膜上皮细胞与肠道菌群之间也有密切的合作，肠道菌群水解膳食纤维 (多糖) 产生单糖并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为宿主上皮细胞提供能量、信号调控等功能物质 [49-51]。显而易见，对这些共代谢过程的深入认识有利于揭示肠道菌群对宿主代谢表型的贡献与机制。

3　宿主-菌群的共代谢与哺乳动物的代谢表型

哺乳动物的代谢表型包含宿主、肠道菌群及二者共代谢的综合信息，是其分子表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肠道菌群的基因组、转录组及蛋白质组无法进行准确定量测量时，代谢表型的定量能够提供动物生理及病理生理 [52-57]、宿主与肠道菌群共生相互作用及肠道菌群功能的关键分子信息 [8,25,58-60]。动物体液及组织等中的代谢物的组成 (代谢组) 重要而复杂，其所含代谢物的种类繁多、浓度范围大、物理化学性质及所在基质各异 [43,61]。定量分析动物体液、细胞、组织及活体的全部代谢物组成与变化规律却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世界性难题。

目前，核磁共振波谱 (NMR) 与质谱技术是优势与信息互补的两大主流代谢表型定量分析手段 [56,62-65]。前者具有优异的重现性，在无需破坏样品的条件下即可对体液、细胞、组织及活体的代谢表型进行原位无创的定量刻画。NMR 技术能提供的物质的原子间连接关系便于代谢物的定性，是准确鉴定微量代谢物绝对结构的独一无二手段。NMR 对不同代谢物的响应 (系数) 相同，且所获信号的强度与代谢物浓度成线性正比关系，定量简单而便捷。基于滤波技术的谱编辑实验方法丰富而灵活，可以在不分离样品的前提下对代谢物信号进行选择性检测，便于目标代谢物的原位无创定量分析。高分辨魔角旋转核磁共振 (high-resolution magic-angle spinning NMR, HRMAS NMR) 是细胞 [66] 与组织 [67-70] 代谢组原位无创定量分析的关键技术手段；核磁共振活体谱 (MRS *in vivo*) 则是适合临床应用的活体代谢表型的原位无创分析核心技术。

质谱技术灵敏而重现性好。代谢组质谱分析常需要与色谱分离技术进行结合，以提高灵敏度、同分异构体分辨与定性能力。常用于代谢组分析的质谱包括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 (QTOF-MS)、三重串联四级杆质谱、傅里叶变换质谱 (FT-ICR) 等，而色谱 - 质谱联用技术包括液相色谱 - 质谱 (LC-MS)、气相色谱 - 质谱 (GC-MS) 及毛细管电泳 - 质谱 (CE-MS)，上述技术已广泛用于体液、细胞与组织提取物的非原位分析 [56,63-65]。质谱的直接进样分析虽具有速度快等特点，但常因样品中盐的存在而受到制约 [71]。近年来，基于电喷雾解吸电离 (DESI) 与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 (MALDI) 等技术的质谱成像方法得到了快速发展，该技术可分析组织切片表面代谢物的丰度及空间分布，在分子组织病理学研究等方面表现出了良好的临床应用潜力 [72-75]。

然而，实践中需要特别注意上述两大主流技术各有的不足。核磁共振技术对小分子代谢物的分析灵敏度在纳克或微摩尔浓度量级，代谢物的定性或准确鉴定需要系列二维谱的验证。质谱技术对不同代谢物的响应相差较大而影响同步定量，对代谢物的准确定性需要参考色谱保留时间、母离子质荷比及子离子 (或中性碎片) 的相对丰度，同时需要使用标准品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对于完全未知代谢物难以使用质谱进行结构的准确鉴定。在实践中，上述两大主流技术的选择必须考虑其各自的优势和不

足、科学问题和研究目的与技术的匹配性、数据分析方法对上述技术所得数据的适用性、数据处理所得结果的物理含义等多种因素。事实上，上述两大技术的有机结合与优势集成是代谢表型精密测量与定量分析的理想方法[76,77]。这种结合包括两种技术所获数据的逻辑结合、基于运算的统计相关结合[78-84]与基于物理连接的联用技术。已有的 LC-DAD-SPE-CryoNMR-MS 联用技术就可以在色谱分离的同时采集代谢物的紫外可见光谱、核磁共振谱及质谱数据[85-91]，进而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此联用技术已成为新代谢物的发现与结构准确鉴定的重要手段。其中，低丰度代谢物可以通过固相萃取微柱进行多次富集后进行详尽的谱学分析，进而实现对微量完全未知代谢物绝对结构的准确鉴定。

多变量统计分析是广泛用于代谢组数据挖掘的技术[92-94]，所获数据是阐明发育和基因改变等内因及应激和药物等环境因素对代谢表型影响规律的基础。代谢物信号的归一化与标准化是此数据分析的必需预处理步骤，鉴于不同代谢物的核磁共振响应相似但质谱响应差别较大，相关数据预处理方法的选用必须考虑数据的来源与处理后数据的物理意义。此外，PLS-DA 与 OPLS-DA 等监督性分析模型无一例外地需要严格的验证[95-97]。

对哺乳动物的代谢表型分析而言，宿主代谢与宿主 - 菌群共代谢是两个关键贡献源。宿主消化道是多数肠道菌群的居所，消化道不同区段的代谢特征及其发育依赖性值得关注。HRMAS-NMR 技术对大鼠[98]、小鼠[60]和人类[81,99]肠道组织代谢表型的无创原位分析已有较为详细的报道。这些研究发现模式动物[60,98]与人类[81,99]肠道代谢表型具有鲜明的区段特异性，小肠和大肠组织的代谢表型差异尤为突出；模式动物的肠道区域代谢特征有显著地发育依赖性[98]。事实上，这些不同肠段内的肠道菌群结构及内容物代谢物组成均有显著差异，并同时存在发育依赖性[60,100]。定量分析肠道菌群的结构(及组成)、代谢表型及肠段依赖性是阐明其功能的关键，也是阐明肠道菌群对宿主生理与病理生理过程的影响规律，发展有效干预策略措施与维护健康的重点。然而，肠道菌群中绝大多数微生物尚无法在体外得到有效培养，这成为其功能研究的一个瓶颈问题，也必将成为微生物学及肠道微生态学领域的一个重要任务。

鉴于此，肠道内容物代谢物组成分析已成为研究宿主 - 肠道菌群共代谢相互作用的重要途径。多数肠道微生物的功能会以其代谢物影响宿主生理过程而得以体现，肠道菌群整体的代谢表型携带着肠道菌群代谢及宿主 - 肠道菌群共代谢的分子信息。因此，多种实验参数优化型的哺乳动物粪样代谢组提取与检测分析方法得到了发展建立[24,101]，多项研究工作已见报道[21,30,101-106]。结果表明，人类及啮齿动物粪样代谢组之间存在显著的物种依赖性[102]；大鼠消化道内容物的代谢组具有明显的肠段与发育依赖性，该代谢表型能清晰地反映大鼠肠段的营养吸收等功能[24]。粪样代谢组分析也已用于对炎症性肠病[21,103]、肝硬化与肝细胞肿瘤[104]、慢性胰腺炎[105]及大肠癌[30,106]等多种重大疾病的诊断研究；肠道菌群功能发生改变时，其典型代谢物甲胺、三甲胺与短链脂肪酸(即膳食纤维的细菌发酵产物)均会发现显著变化[24,59,107]。

尿液代谢组分析是研究宿主 - 肠道菌群共代谢相互作用的又一有效途径。已有研究表明，哺乳动物尿液中既有宿主与肠道菌群各自的代谢信息，也包含丰富的宿主 - 肠道菌群共代谢信息[40]，人类尿液代谢表型与其肠道菌群之间还存在广泛而密切的相关性[40]。一系列尿液代谢组分析表明，肠道菌群与宿主的共代谢相互作用既对宿主的正常生理过程有其贡献，也对宿主的病理生理与药物等有效干预过程有显著影响[8,42,108-110]。这些共代谢过程与营养及植物药的作用[111]、寄生虫病[44-45,112-113]及胰岛素抵抗等代谢异常[35]密切相关。尿液代谢组与肠道菌群宏基因组的整合分析有利于发现代谢与微生物之间的相关性，是研究共生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思路[40]，是认识肠道菌群与疾病防治关系的途径。然而，肠道菌群对宿主尿液代谢表型直接贡献的详细内涵依然需要深入研究。

4 展望

宿主与肠道菌群共代谢研究需要代谢组技术的进一步突破。目前，代谢表型组的核磁共振与质谱分析方法虽已成型但远未成熟[114-117]，新技术与新方法及新装置的发展依然是核心任务，低丰度代谢物的更高覆盖分析是代谢表型定性与定量刻画的根本需求。代谢物对宿主、肠道菌群及宿主 - 肠道菌群相互作用等方面的功能与机制需要深入研究。肠道微生物的体外培养技术是肠道菌群结构及功能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1] Lederberg J. Infectious history. Science, 2000, 288: 287-93

[2] Qin JJ, Li RQ, Raes J, et al. A human gut microbial gene catalogue established by metagenomic sequencing. Nature, 2010, 464: 59-65

[3] Xu J, Bjursell MK, Himrod J, et al. A genomic view of the human-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 symbiosis. Science, 2003, 299: 2074-6

[4] Nicholson JK, Holmes E, Wilson ID. Gut microorganisms, mammalian metabolism and personalized health care. Nat Rev Microbiol, 2005, 3: 431-8

[5] Ley RE, Hamady M, Lozupone C, et al. Evolution of mammals and their gut microbes. Science, 2008, 320: 1647-51

[6] Backhed F, Ley RE, Sonnenburg JL, et al. Host-bacterial mutualism in the human intestine. Science, 2005, 307: 1915-20

[7] Yatsunenko T, Rey FE, Manary MJ, et al. Human gut microbiome viewed across age and geography. Nature, 2012, 486: 222

[8] Nicholson JK, Holmes E, Kinross J, et al. Host-gut microbiota metabolic interactions. Science, 2012, 336: 1262-7

[9] Xu J, Chiang HC, Bjursell MK, et al. Message from a human gut symbiont: sensitivity is a prerequisite for sharing. Trends Microbiol, 2004, 12: 21-8

[10] Hooper LV, Gordon JI. Commensal host-bacterial relationships in the gut. Science, 2001, 292: 1115-8

[11] Hooper LV, Littman DR, Macpherson AJ.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icrobiota and the immune system. Science, 2012, 336: 1268-73

[12] Macpherson A, Khoo UY, Forgacs I, et al. Mucosal antibodies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re directed against intestinal bacteria. Gut, 1996, 38: 365-75

[13] Peterson DA, McNulty NP, Guruge JL, et al. IgA response to symbiotic bacteria as a mediator of gut homeostasis. Cell Host Microbe, 2007, 2: 328-39

[14] Kau AL, Ahern PP, Griffin NW, et al. Human nutrition, the gut microbiome and the immune system. Nature, 2011, 474: 327-36

[15] Garrett WS, Gordon JI, Glimcher LH. Homeostasis and inflammation in the intestine. Cell, 2010, 140: 859-70

[16] Sanz Y, Santacruz A, Gauffin P. Gut microbiota in obesity and metabolic disorders. Proc Nutri Soc, 2010, 69: 434-41

[17] Turnbaugh PJ, Hamady M, Yatsunenko T, et al. A core gut microbiome in obese and lean twins. Nature, 2009, 457: 480-4

[18] Ley RE, Backhed F, Turnbaugh P, et al. Obesity alters gut microbial ecology.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5, 102: 11070-5

[19] Ley RE, Turnbaugh PJ, Klein S, et al. Microbial ecology-human gut microbes associated with obesity. Nature, 2006, 444: 1022-3

[20] Turnbaugh PJ, Ley RE, Mahowald MA, et al. An obesity-associated gut microbiome with increased capacity for energy harvest. Nature, 2006, 444: 1027-31

[21] Marchesi JR, Holmes E, Khan F, et al. Rapid and non-invasive metabonomic characterisation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J Proteome Res, 2007, 6: 546-52

[22] (a) Zhang XY, Wang YL, Hao FH, et al. Human serum metabonomic analysis reveals progression axes for glucose intolerance and insulin resistance statuses. J Proteome Res, 2009, 8: 5188-95. (b) Zhang CH, Yin AH, Li HD, et al. Dietary modulation of gut microbiota contributes to alleviation of both genetic and simple obesity in children. eBioMedicine, 2015, 2: 968-84. (c) An YP, Xu WX, Li HH, et al. High-fat diet induces dynamic metabolic alterations in multiple biological matrices of rats. J Proteome Res, 2013, 12: 3755-68

[23] Backhed F, Ding H, Wang T, et al. The gut microbiota as an environmental factor that regulates fat storage.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4, 101: 15718-23

[24] (a) Tian Y, Zhang LM, Wang YL, et al. Age-related topographical metabolic signatures for the rat gastrointestinal contents. J Proteome Res, 2012, 11: 1397-411. (b) Lin H, An Y, Hao F, et al. Correlations of fecal metabonomic and microbiomic changes induced by high-fat diet in the pre-obesity state. Sci Rep,2016, 6: 21618. (c) Zhao Y, Wu JF, Li JV, et al. Gut microbiota composition modifies fecal metabolic profiles in mice. J Proteome Res, 2013, 12: 2987-99

[25] Martin FP, Dumas ME, Wang YL, et al. A top-down systems biology view of microbiome- mammalian metabolic interactions in a mouse model. Mol Systems Biol, 2007, 3: 112

[26] Swann JR, Want EJ, Geier FM, et al. Systemic gut microbial modulation of bile acid metabolism in host tissue compartment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1, 108: 4523-30

[27] Li JV, Ashrafian H, Bueter M, et al. Metabolic surgery profoundly influences gut microbial-host metabolic cross-talk. Gut, 2011, 60: 1214-23

[28] Ridlon JM, Kang DJ, Hylemon PB. Bile salt biotransformations by human intestinal bacteria. J Lipid Res, 2006, 47: 241-59

[29] Jones BV, Begley M, Hill C, et al. Functional and comparative metagenomic analysis of bile salt hydrolase activity in the human gut microbiome.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8, 105: 13580-5

[30] O'Keefe SJD, Ou JH, Aufreiter S, et al. Products of the colonic microbiota mediate the effects of diet on colon cancer risk. J Nutr, 2009, 139: 2044-8

[31] Hope ME, Hold GL, Kain R, et al. Sporadic colorectal cancer - role of the commensal microbiota. FEMS Microbiol Lett, 2005, 244: 1-7

[32] (a) Stepankova R, Tonar Z, Bartova J, et al. Absence of microbiota (germ-free conditions) accelerates the atherosclerosis in Apoe-deficient mice fed standard low cholesterol diet. J Atheroscl Thromb, 2010, 17: 796-804. (b) Li D, Zhang L, Dong F, et al. Metabonomic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atherosclerosis progression for *LDLR*$^{-/-}$ mice. J Proteome Res, 2015, 14: 2237-54

[33] Rhee SH, Pothoulakis C, Mayer EA. Principle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brain-gut-enteric microbiota axis.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09, 6: 306-14
[34] Parracho HMRT, Bingham MO, Gibson GR, et 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ut microflora of children with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 and that of healthy children. J Med Microbiol, 2005, 54: 987-91
[35] Xu WX, Wu JF, An YP, et al. Streptozotocin-induced dynamic metabonomic changes in rat biofluids. J Proteome Res, 2012, 11: 3423-35
[36] Dumas ME, Barton RH, Toye A, et al. Metabolic profiling reveals a contribution of gut microbiota to fatty liver phenotype in insulin-resistant mice.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6, 103: 12511-6
[37] Clayton TA, Lindon JC, Cloarec O, et al. Pharmaco-metabonomic phenotyping and personalized drug treatment. Nature, 2006, 440: 1073-7
[38] Clayton TA, Baker D, Lindon JC, et al. Pharmacometabonomic identification of a significant host-microbiome metabolic interaction affecting human drug metabolism.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9, 106: 14728-33
[39] Wilson ID, Nicholson JK. The role of gut microbiota in drug response. Curr Pharmaceut Design, 2009, 15: 1519-23
[40] Li M, Wang BH, Zhang MH, et al. Symbiotic gut microbes modulate human metabolic phenotype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8, 105: 2117-22
[41] Hooper LV, Wong MH, Thelin A, et al. Molecular analysis of commensal host-microbial relations hips in the intestine. Science, 2001, 291: 881-4
[42] Zheng XJ, Xie GX, Zhao AH, et al. The footprints of gut microbial-mammalian co-metabolism. J Proteome Res, 2011, 10: 5512-22
[43] Nicholson JK, Wilson ID. Understanding 'global' systems biology: metabonomics and the continuum of metabolism. Nat Rev Drug Discov, 2003, 2: 668-76
[44] Wang YL, Holmes E, Nicholson JK, et al. Metabonomic investigations in mice infected with *Schistosoma mansoni*: an approach for biomarker identifica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4, 101: 12676-81
[45] Wang YL, Utzinger J, Saric J, et al. Global metabolic responses of mice to *Trypanosoma brucei brucei* infec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8, 105: 6127-32
[46] Zhang LM, Ye YF, An YP, et al. Systems responses of rats to aflatoxin B1 exposure revealed with metabonomic changes in multiple biological matrices. J Proteome Res, 2011, 10: 614-23
[47] Martin FP, Wang Y, Sprenger N, et al. Top-down systems biology integration of conditional prebiotic modulated transgenomic interactions in a humanized microbiome mouse model. Mol Syst Biol, 2008, 4: 205
[48] Wang ZN, Klipfell E, Bennett BJ, et al. Gut flora metabolism of phosphatidylcholine promote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Nature, 2011, 472: 57-63
[49] Fukuda S, Toh H, Hase K, et al. Bifidobacteria can protect from enteropathogenic infection through production of acetate. Nature, 2011, 469: 543-7
[50] Scheppach W. Effects of short-chain fatty-acids on gut morphology and function. Gut, 1994, 35: S35-8
[51] Wong JM, de Souza R, Kendall CW, et al. Colonic health: fermentation and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J Clin Gastroenterol, 2006, 40: 235-43
[52] Nicholson JK, Connelly J, Lindon JC, et al. Metabonomics: a platform for studying drug toxicity and gene function. Nat Rev Drug Discov, 2002, 1: 153-61
[53] Wijeyesekera A, Selman C, Barton RH, et al. Metabotyping of long-lived mice using ^{1}H NMR spectroscopy. J Proteome Res, 2012, 11: 2224-35
[54] Kinross JM, Holmes E, Darzi AW, et al. Metabolic phenotyping for monitoring surgical patients. Lancet, 2011, 377: 1817-9
[55] Holmes E, Loo RL, Stamler J, et al. Human metabolic phenotype diversity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diet and blood pressure. Nature, 2008, 453: 396-400
[56] Nicholson JK, Lindon JC. Systems biology-metabonomics. Nature, 2008, 455: 1054-6
[57] Holmes E, Wilson ID, Nicholson JK. Metabolic phenotyping in health and disease. Cell, 2008, 134: 714-7
[58] Martin FPJ, Collino S, Rezzi S. ^{1}H NMR-based metabonomic applications to decipher gut microbial metabolic influence on mammalian health. Magn Reson Chem, 2011, 49: S47-54
[59] Martin FPJ, Sprenger N, Montoliu I, et al. Dietary modulation of gut functional ecology studied by fecal metabonomics. J Proteome Res, 2010, 9: 5284-95
[60] Martin FP, Wang Y, Yap IK, et al. Topographical variation in murine intestinal metabolic profiles in relation to microbiome speciation and functional ecological activity. J Proteome Res, 2009, 8: 3464-74
[61] Nicholson JK, Holmes E, Lindon JC, et al. The challenges of modeling mammalian biocomplexity. Nat Biotechnol, 2004, 22: 1268-74
[62] Tang HR, Wang YL. Metabonomics: a revolution in progress. Prog Biochem Biophys, 2006, 33: 401-7
[63] Tian J, Shi CY, Gao P, et al. Phenotype differentiation of three *E.coli* strains by GC-FID and GC-MS based metabolomics. J Chromat Anal Technol Biomed Life Sci, 2008, 871: 220-6
[64] Wilson ID, Plumb R, Granger J, et al. HPLC-MS-based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metabonomics. J Chromat Anal Technol Biomed Life Sci, 2005, 817: 67-76
[65] Lenz EM, Wilson ID. Analytical strategies in metabonomics. J Proteome Res, 2007, 6: 443-58
[66] Humpfer E, Spraul M, Nicholls AW, et al. Direct observation of resolved intracellular and extracellular water signals in intact human red blood cells using ^{1}H MAS NMR spectroscopy. Magn Reson Med, 1997, 38: 334-6
[67] Cheng LL, Ma MJ, Becerra L, et al. Quantitative neuropathology by high resolution magic angle spinning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97, 94: 6408-13
[68] Cheng LL, Chang IW, Louis DN, et al. Correlation of high-resolution magic angle spinning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with histopathology of intact human brain tumor specimens. Cancer Res, 1998, 58:

1825-32

[69] Ding LN, Hao FH, Shi ZM, et al. Systems biological responses to chronic perfluorododecanoic acid exposure by integrated metabonomic and transcriptomic studies. J Proteome Res, 2009, 8: 2882-91

[70] Yang YX, Li CL, Nie X, et al. Metabonomic studies of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using high-resolution magic-angle spinning ^{1}H NMR spectroscopy in conjunction with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J Proteome Res, 2007, 6: 2605-14

[71] Beckmann M, Parker D, Enot DP, et al. High-throughput, nontargeted metabolite fingerprinting using nominal mass flow injection electrospray mass spectrometry. Nat Protoc, 2008, 3: 486-504

[72] Fonville JM, Carter C, Cloarec O, et al. Robust data processing and normalization strategy for MALDI mass spectrometric imaging. Anal Chem, 2012, 84: 1310-9

[73] Nemes P, Woods AS, Vertes A. Simultaneous imaging of small metabolites and lipids in rat brain tissues at atmospheric pressure by laser ablation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Anal Chem, 2010, 82: 982-8

[74] Koizumi S, Yamamoto S, Hayasaka T, et al. Imaging mass spectrometry revealed the production of lysophosphatidylcholine in the injured ischemic rat brain. Neuroscience, 2010, 168: 219-25

[75] Cooks RG, Ouyang Z, Takats Z, et al. Ambient mass spectrometry. Science, 2006, 311: 1566-70

[76] Dai H, Xiao CN, Liu HB, et al. Combined NMR and LC-MS analysis reveals the metabonomic changes in *Salvia miltiorrhiza* bunge induced by water depletion. J Proteome Res, 2010, 9: 1460-75

[77] Dai H, Xiao CN, Liu HB, et al. Combined NMR and LC-DAD-MS analysis reveals comprehensive metabonomic variations for three phenotypic cultivars of *Salvia miltiorrhiza* bunge. J Proteome Res, 2010, 9: 1565-78

[78] Holmes E, Loo RL, Cloarec O, et al. Detection of urinary drug metabolite (xenometabolome) signatures in molecular epidemiology studies via statistical total correlation (NMR) spectroscopy. Anal Chem, 2007, 79: 2629-40

[79] Cloarec O, Campbell A, Tseng LH, et al. Virtual chromatographic resolution enhancement in cryoflow LC-NMR experiments via statistical total correlation spectroscopy. Anal Chem, 2007, 79: 3304-11

[80] Smith LM, Maher AD, Cloarec O, et al. Statistical correlation and projection methods for improved information recovery from diffusion-edited NMR spectra of biological samples. Anal Chem, 2007, 79: 5682-9

[81] Wang YL, Cloarec O, Tang HR, et al. Magic angle spinning NMR and ^{1}H-^{31}P heteronuclear statistical total correlation spectroscopy of intact human gut biopsies. Anal Chem, 2008, 80: 1058-66

[82] Maher AD, Fonville JM, Coen M, et al. Statistical total correlation spectroscopy scaling for enhancement of metabolic information recovery in biological NMR spectra. Anal Chem, 2012, 84: 1083-91

[83] Cloarec O, Dumas ME, Craig A, et al. Statistical total correlation spectroscopy: an exploratory approach for latent biomarker identification from metabolic ^{1}H NMR data sets. Anal Chem, 2005, 77: 1282-9

[84] Crockford DJ, Lindon JC, Cloarec O, et al. Statistical search space reduction and two-dimensional data display approaches for UPLC-MS in biomarker discovery and pathway analysis. Anal Chem, 2006, 78: 4398-408

[85] Lommen A, Godejohann M, Venema DP, et al. Application of directly coupled HPLC-NMR-MS to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onfirmation of quercetin glycosides and phloretin glycosides in apple peel. Anal Chem, 2000, 72: 1793-7

[86] Duarte IF, Godejohann M, Braumann U, et al. Application of NMR spectroscopy and LC-NMR/MS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carbohydrates in beer. J Agri Food Chem, 2003, 51: 4847-52

[87] Corcoran O, Spraul M. LC-NMR-MS in drug discovery. DDT, 2003, 8: 624-31

[88] Spraul M, Freund AS, Nast RE, et al. Advancing NMR sensitivity for LC-NMR-MS using a cryoflow probe: application to the analysis of acetaminophen metabolites in urine. Anal Chem, 2003, 75: 1536-41

[89] Holmes E, Tang HR, Wang YL, et al. The assessment of plant metabolite profiles by NMR-based methodologies. Plant Med, 2006, 72: 771-85

[90] (a) Tang HR, Xiao CN, Wang YL. Important roles of the hyphenated HPLC-DAD-SPE-MS/NMR technique in metabonomics. Magn Reson Chem, 2009, 47: S157-62. (b) Liu HB, Zheng AM, Liu HL,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three novel polyphenolic compounds, origanine A-C, with unique skeleton from *Origanum vulgare* L. using the hyphenated LC-DAD-SPE-NMR/MS methods. J Agric Food Chem, 2012, 60: 129-35

[91] Duarte IF, Legido-Quigley C, Parker DA,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metabolites in human hepatic bile using 800 MHz ^{1}H NMR spectroscopy, HPLC-NMR/MS and UPLC-MS. Mol Biosys, 2009, 5: 180-90

[92] Holmes E, Bonner FW, Sweatman BC, et al. Nuclear-magnetic-resonance spectroscopy and pattern-recognition analysis of the biochemical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and recovery from nephrotoxic lesions in the rat induced by mercury(II) chloride and 2-bromoethanamine. Mol Pharmacol, 1992, 42: 922-30

[93] Ghauri FY, Nicholson JK, Sweatman BC, et al. NMR spectroscopy of human postmortem cerebrospinal-fluid-distinction of alzheimers-disease from control using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statistics. NMR Biomed, 1993, 6: 163-7

[94] Gartland KP, Beddell CR, Lindon JC, et al. A pattern-recognition approach to the comparison of PMR and clinical chemical-data for classification of nephrotoxicity. J Pharm Biomed Anal, 1990, 8: 963-8

[95] Lindon JC, Nicholson JK, Holmes E, et al. Summary recommendations for standardization and reporting of metabolic analyses. Nat Biotechnol, 2005, 23: 833-8

[96] Eriksson L, Trygg J, Wold S. CV-ANOVA for significance testing of PLS and OPLS models. J Chemometr, 2008, 22: 594-600

[97] Trygg J, Wold S. Orthogonal projections to latent struc-

tures (O-PLS). J Chemometr, 2002, 16: 119-128
[98] Wang YL, Tang HR, Holmes E, et al. Bio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rat intestine development using high-resolution magic-angle-spinning ^{1}H NMR spectroscopy and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J Proteome Res, 2005, 4: 1324-9
[99] Wang YL, Holmes E, Comelli EM, et al. Topographical variation in metabolic signatures of human gastrointestinal biopsies revealed by high-resolution magic-angle spinning ^{1}H NMR spectroscopy. J Proteome Res, 2007, 6: 3944-51
[100] Hopkins MJ, Sharp R, Macfarlane GT. Age and disease related changes in intestinal bacterial popular-ions assessed by cell culture, 16sRNA abundance, and community cellular fatty acid profiles. Gut, 2001, 48: 198-205
[101] Wu JF, An YP, Yao JW, et al. An optimised sample preparation method for NMR-based faecal metabonomic analysis. Analyst, 2010, 135: 1023-30
[102] Saric J, Wang Y, Li J, et al. Species variation in the fecal metabolome gives insight into differential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J Proteome Res, 2008, 7: 352-60
[103] Le Gall G, Noor SO, Ridgway K, et al. Metabolomics of fecal extracts detects altered metabolic activity of gut microbiota in ulcerative colitis and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J Proteome Res, 2011, 10: 4208-18
[104] Cao HC, Huang HJ, Xu W, et al. Fecal metabolome profiling of liver cirrhosi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atients by 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Anal Chim Acta, 2011, 691: 68-75
[105] Naruse S, Ishiguro H, Ko SB, et al. Fecal pancreatic elastase: a reproducible marker for severe exocrine pancreatic insufficiency. J Gastroenterol, 2006, 41: 901-8
[106] Hu S, Dong TS, Dalal SR, et al. The microbe-derived short chain fatty acid butyrate targets miRNA-dependent p21 gene expression in human colon cancer. PLoS One, 2011, 6: e16221
[107] Jacobs DM, Deltimple N, van Velzen E, et al. ^{1}H NMR metabolite profiling of feces as a tool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nutrition on the human microbiome. NMR Biomed, 2008, 21: 615-26
[108] Holmes E, Kinross J, Gibson GR, et al. Therapeutic modulation of microbiota-host metabolic interactions. Sci Transl Med, 2012, 4: 137rv6
[109] Wang XN, Wang XY, Xie GX, et al. Urinary metabolite vari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pathological progression of the post-Hepatitis B cirrhosis patients. J Proteome Res, 2012, 11: 3838-47
[110] Cheng Y, Xie GX, Chen TL, et al. Distinct urinary metabolic profile of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J Proteome Res, 2012, 11: 1354-63
[111] (a) Wang YL, Tang HR, Nicholson JK, et al. A metabonomic strategy for the detection of the metabolic effects of chamomile (*Matricaria recutita* L.) ingestion. J Agri Food Chem, 2005, 53: 191-6. (b) Shi X, Xiao C, Wang Y, et al. Gallic acid intake induces alterations to systems metabolism in rats. J Proteome Res, 2013, 12: 991-1006
[112] Wu JF, Holmes E, Xue J et al. Metabolic alterations in the hamster co-infected with *Schistosoma japonicum* and *Necator americanus*. Int J Parasitol, 2010, 40: 695-703
[113] Wu JF, Xu WX, Ming ZP, et al. Metabolic changes reveal the development of schistosomiasis in mice. PLoS Negl Trop Dis, 2010, 4: e807
[114] Dunn WB, Broadhurst D, Begley P, et al. Procedures for large-scale metabolic profiling of serum and plasma using gas chromatography and liquid chromatography coupled to mass spectrometry. Nat Protoc, 2011, 6: 1060-83
[115] Chan ECY, Pasikanti KK, Nicholson JK. Global urinary metabolic profiling procedures using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Nat Protoc, 2011, 6: 1483-99
[116] Beckonert O, Coen M, Keun HC, et al. High-resolution magic-angle-spinning NMR spectroscopy for metabolic profiling of intact tissues. Nat Protoc, 2010, 5: 1019-32
[117] Beckonert O, Keun HC, Ebbels TM, et al. Metabolic profiling, metabolomic and metabonomic procedures for NMR spectroscopy of urine, plasma, serum and tissue extracts. Nat Protoc, 2007, 2: 2692-703